

目 录

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张执一 (1)
回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袁超俊 (21)
叶挺将军二、三事·····	李任夫 (29)
延安——七里坪——武汉往返记·····	汪 群 (36)
抗战初期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	吴莆生 (41)
武汉大汉奸——叶蓬·····	吴 名 (48)
叶蓬汉奸案的处理·····	鲍志鸿 (63)
汉奸熊剑东和黄卫军·····	朱绍文 (66)
日伪武汉警察总监刘翰如·····	刘元学 (79)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汉口分行始末·····	志 久 (84)
金亦吾与三青团武汉支团·····	郑桓武 (94)
日本投降后的日伪动态记要·····	张孟青 (103)
战后日侨的集中管理·····	刘崇德 (118)
曼谷机器业华侨工人的斗争·····	黄 敏 (129)
民众乐园的前身——新市场·····	龙从启 (145)
武汉经济略谈 (下) ·····	扬 铎 (151)
武汉的棉花行·····	王兆麟 (167)
武汉皮鞋业发展简史·····	李庆华 陆政跃 (177)
武汉图书文化用品业的回顾·····	喻雨庭 舒兴文 (181)
老锦春酱园·····	王远志 (188)
红菜苔史话·····	龚成柄 (192)
来信摘登·····	(196)

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张 执 一

威震襄南敌伪顽，
轻装挺进汉江间。
不辜父老来苏望，
千里洪湖指日还。

《饮马长江》（一九四三年）

翻阅旧日积存诗稿，这几行文字蓦然映入我的眼帘，激起了我对抗日战争时期，转战在中原地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游击健儿，挺进襄南重返洪湖的追忆。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五师的干部都是中青年。我们的负责人中，年青的在二十五岁左右，年纪大些的也只三十岁左右。主要负责人李先念同志刚到三十岁，任质斌同志才二十五六岁，陈少敏同志稍大一点，也不过三十来岁。后来来到这个地区负责的郑位三同志，被我们尊称为“位老”，其实，才四十多一点。那是一段耐人怀念的岁月，同志间生死与共，艰难同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整日里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彼此有了意见进行争论，相互批评与帮助，甚至上下级间争吵得面红耳赤以致对骂，说开了就完事，毫不记成见。上下级关系也不是那么严格，地位可以互换。一时某人成了上级，一时又成了下级，大家习以为常，不会因此带来不满。现在回想起那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仍使人回味无穷。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使我最难忘记的就是进军襄南这段经历。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三打侏儒山，开辟川汉沔地区，从东翼楔入襄南；一九四三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又由西翼挥麾南进，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洪湖根据地，使我江汉地区（包括襄南）与鄂中、鄂东、鄂南联成一片，互相策应，最后实现从四面八方战略包围武汉的壮举。

开辟襄南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体现。

（一）

滔滔襄河，出秦岭，经鄂西北，至武汉与长江合流。襄南是指从沙洋到武汉之间，襄河以南，长江之北，包括江陵、潜江、沔阳、监利、汉阳等县和天门、京山（当时京山县一部分地方如聂家滩在襄河南岸）、汉川、荆门、石首等县局部，面积共万余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区。

襄南扼武汉西达四川的水陆通道，从汉阳有东荆河直通沙市，又有汉宜公路经沙市到宜昌。沟渠纵横，湖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就在这一带蓬勃兴起。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部分。“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这战斗的歌声曾经响彻江河两岸。自从一九三二年秋天，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离开这里以后，先是国民党反动军队随带一些恶霸地主武装还乡团卷土重来，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襄南各县县城，将其魔爪伸向川（汉川）汉（汉阳）沔（沔阳）地区。“犹记当年革命歌，有谁无愤控顽倭。滔滔夏汛襄江浪，难比人民血泪多。”“北山长望欲飞魂，久久难忘血

泪痕。风雪寒宵闻犬吠，犹疑战士夜回村。”（作于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和敌伪蹂躏下的襄南人民，何等深切地怀念着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啊！

早在日寇侵占武汉之初，襄南地下党就曾领导当地革命人民，建立了几支小型武装，后编入我新四军鄂中部队。在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创建初期，我们遵照当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的指示，就由东翼数度进入襄南，在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境烧起抗日游击战争烽火。

一九三九年八月，新四军鄂中独立游击支队成立不久，第四团团长李人林和政委雍文涛同志等就曾率第四团经汉湖飞渡襄南，与汉阳县老党员肖利三、肖文安父子创建的汉阳县地方党的武装五中队并肩战斗，击溃了盘据高庙的伪和平救国军九十二师熊光部队。

一九四〇年二月，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已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首长李先念、陶铸等同志曾率领蔡松荣（团长，现改名蔡斯烈）和杨焕民（团政委）的第五团二渡襄河，第四团（团长李人林，政委周志刚）在襄河边策应，打击侏儒山一带的伪和平救国军八十二师汪步青部队。我军在攻占侏儒山集镇街道，毙伪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二十余人后胜利北返。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革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曾随军采访写过报道，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中，她以《挺进纵队和矿工》为题，记述了五团的成长。

同年八月，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我持董必武同志给当时在汉阳一带掌握一千多伪军的杨经曲的电报，到汉阳蔡甸附近之官塘角一带，在当地地下党（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等同志）配合下，我们争取到杨经曲、黄人杰等率伪八十二师下属的一六五旅一千五百余名官兵反正。杨黄起义后，我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和

这支起义部队，后又加上十团，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下设三个团。杨经曲为支队司令，王海山同志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郑绍文同志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同志不久调走，我则继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接二连三的胜利，打击了敌伪，鼓舞了襄南人民。由于那时我们的重点是发展路东（即平汉路以东的鄂东地区），所以主力部队一直未能向襄南纵深发展。

（二）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为五师第一纵队，杨经曲任司令，因王海山同志调任五师十五旅旅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则由张文津同志充任，我仍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过了一段时期，第一纵队编入十五旅，取消了第一纵队番号，杨经曲改任十五旅旅长，原旅长王海山同志改任副旅长，周志刚同志仍任政委，张文津同志任参谋长，我改任政治部主任，杜邦宪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我同时受鄂豫边区党委委托，负责指导十五旅活动地区的襄西地委、天汉地委，以及京（山）钟（祥）、天（门）京（山）潜（江）、京北（京山北部）三个县委的工作，因而对该地区地方工作得以预闻。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执行“以战养战”的反动方针，加紧搜刮战争资源，巩固其在华占领区，突向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进攻。敌华中派遣军派其主力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配合伪军向我鄂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与之密切配合向我进行挑畔。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牵制敌人主力，粉碎敌伪顽夹击，以扩大我军回旋区，新四军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由我率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直插武汉近郊汉

阳，为我军向襄南的川汉沔地区发展作准备。我们在汉川、汉阳地区活动不久，即将川（汉川）阳（汉阳）工委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天汉游击支队。这支部队的纪律虽不甚好，但对地方情况熟悉，其中不少亡命之徒，对我军帮助很大。

一九四一年九月下旬，我率这支小分队回到故乡汉阳之索河和蔡甸附近之官塘角（当时蔡甸镇虽是日寇据点，但周围乡村均是我活动区）、长新集、蓼山一带。一面扩大活动地区，开辟财源，一面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根据师首长指示，我们第一步是争取他们不坚决与我们为敌，第二步则争取他们反正，接受我军整编。

当时，盘踞汉阳的伪军仍是汪步青部。原来，汪步青自从一九四〇年遭受我军打击后，在日寇卵翼下，他的部队有较大扩充，自认为羽翼已丰。他们换上伪定国军第一师的招牌，拥有三个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共五千余兵力，还有兵工厂自制步枪。汪步青任伪定国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盘踞在沔阳的彭家场，下汉埠、邹家帮、西流河、双河口，汉川的南河渡，以及汉阳的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三羊头、东江脑、水洪口、曲口、窖头沟、消泗沟、九沟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我来到汉阳不久，就通过当地士绅带信，向他交代我党政策，敦促其反正，但汪步青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扬言：“我有万人之众，新四军其奈我何！”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家伙，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三）

汉阳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土地革命时期，当地农民运动领袖沈万川、高明山、高士俊、高士全（以后改名高纯一、高树颐）等同志，领导消泗沟和九沟一带的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参加工农红军，后来在西征途中虽相继壮烈牺牲，然而烈士们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故乡人民的革命斗志。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汉阳人民又派遣他们的英雄儿女，北渡襄河，参加到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行列。人心向我，使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我们依靠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并争取到当地开明士绅的帮助，不久就弄清敌伪情况，并展开了政治攻势。

为了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我们一到襄南，即各以一个连的兵力，同时夜袭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三个日军据点，拂晓撤离。（这三个据点距武汉市只有三十公里）这次军事行动对敌伪震动很大。有不少伪军或伪方人员，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向我接洽，说明他们决不是死心踏地的汉奸，我们也晓以大义，争取他们。

盘踞川汉沔地区的日寇不多，主要是伪军，汪步青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是其中势力最大者；除此以外，还有伪定国军第二师李太平部一千余人，驻在沙湖、平场和沔阳县城；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的教导团几百人驻沙湖；其余小股伪军均依附日寇分驻在汉川系马口和汉阳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据点。

伪军并非铁块一板，其内部分崩离析，互相倾轧。汪步青既已投降日寇，又与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伪副师长黄潮和参谋处长徐某均系国民党特务，日寇对他并不信任，敌伪之间互相猜忌。汪步青打着“曲线救国”的招牌，一面向敌据点方向修筑工事防日本鬼子，一面又经常向日寇宣抚班、宪兵队送礼行贿，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他们是脚踏两只船。此外，他又为争夺地盘横征暴敛，与刘国钧、李太平的隔阂很深；在伪定国军第一师内部，各地方势力和帮派之间也矛盾重重。

川汉沔地区河网交织，不适宜大兵团作战，针对这一地理条件和伪军特点，我们决定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完成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的任务。遵循这一斗争策略，我们派出干部和基本群众，通过伪军亲友及青洪帮等各种渠道，逐渐渗透到伪一师内部，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伪一师是汪步青利用家族和帮派关系拉起来的。他从黄埔军

校四期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下级军官，因受不了纪律约束，回乡当了帮派头子，结交弟兄很多。武汉沦陷后，他就利用家族帮派关系拉起部队，不久即投靠敌寇，整编为伪军。伪一师的士兵很多是被汪步青骗来的。一九四〇年元月中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访问我们俘虏的二十几名汪步青部伪军后曾经这样报道：“被俘的伪军目光忧郁，面色惨淡，声称他们是被迫加入伪军的。有个伪军说，汉口沦陷后日本人到了黄陂，把他们那个村子烧成平地他听说要招收苦力修铁路，就同五个年青人一起报名，结果被带到侏儒山汪步青这里当了伪军。”可见伪军中很多人并非甘心事敌。另外，汪步青重用的亲信多是沔阳人，这些人的家属在汉阳挨家挨户住着，向每个村子派粮派款，甚至烧的柴草也向老百姓摊派，广大群众非常不满。我们就从这里入手，激发群众对伪军的仇恨。我们对群众说：“汪步青这些沔阳的地主流氓地痞跑到汉阳来帮助日本鬼子搜刮你们，压迫你们，吃你们的粮，烧你们的柴，使你们生活更加困难，你们只有支持新四军抗日才能得到翻身。”

汪步青的兵工厂多是汉阳人，常常受当官的沔阳人欺压，我们又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反对那些沔阳当官的，反正过来，才能得到解放。”对汪步青部队的沔阳人，我们宣传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他们说：“我们是为曲线救国才当伪军的。”我们说：

“当伪军就是替日本人卖命杀自己的同胞，哪有什么曲线救国的事？要救国就得脱离伪军，沔阳洪湖是当年的革命老根据地，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要把老根据地的名声搞坏了！你们应该反正过来，和我们共同抗日。”经过这样分化瓦解，伪一师内部人心涣散，纷纷动摇，有的弃暗投明，向我军提供情报。我们不仅掌握了伪一师的总兵力和各据点兵力部署，对排以上的伪军官情况，也都了如指掌，还把伪一军一段时期的口令也弄到手了。

在政治瓦解工作奏效以后，我们立即报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批准，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参谋长张文津等同志率

所属之四十三团和四十四团夜渡襄河赶来增援，（当时四十五团留在襄西分散坚持，无法抽出）与襄南部队以及天汉游击支队一起，向伪定国军第一师发起军事进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十五旅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各以两连兵力，分两路进袭侏儒山和南河渡，带路的就是从伪一师反正过来的原伪军三位班长。原来，在我军进攻之前，这三位班长就分别对他们的部下说过：“如果有战斗，不管上面什么命令，你们听我的，我叫打就打，不叫打就不打。”不料这件事被汪逆发觉，于是他们结伴到了我们这里。恰在这时，我们从一位派赴汪部作争取工作的地方旧知识分子手中拿回伪一师的十天口令（是汪部参谋处主任参谋提供的），因而我们更增强了以极少兵力夺取胜利的信心。

这次战斗，我军利用伪军口令，顺利通过敌人三道岗哨，一枪未发，即将伪三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歼灭，俘伪团部军需主任以下官兵百余人，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第二天早上，当日军分三路进攻时，我安全转移。

十二月七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全部和天汉游击支队一个大队，分两路向侏儒山、南河渡、桐山头作第二次进攻，第二天清晨调整部署，经激战后，四十四团攻占将军岭和桐山头，俘一连伪军，歼伪机枪营和步兵一百余人；四十三团以一连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军新兵连。后因黄陵矶和大集场日寇在参山会合向我出扰，攻我侧翼，企图截断我四十三团一营归路，于是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十五旅副旅长兼四十三团团长朱立文同志为掩护我的安全，让一只渡船载我渡过索子河，而他自己则不幸牺牲。现在每一念及，我心里都十分难过，我将永远对这位英雄战友表示深切的悼念。

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五旅集中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全部，第三次分三路向侏儒山、周家帮进逼。此时伪军由

于不断遭受我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士气十分低落，不堪一击。有的伪军公开喊道：“汪家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何必替他卖命！”我一举即攻占侏儒山，伪军溃退。驻周家帮之伪司令部在我强攻之下，溃不成军，向汪家场、余家场一线撤退，我军追击时歼敌一营。我军攻进侏儒山以后，群众高兴极了，主动为帮助我们抬运、抢救伤员，还抬着整猪整羊，挑着鲜鱼来慰问我们的部队，至今回想起来，那热烈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眼看伪一师行将覆灭，沙湖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及伪二师李太平部千余人，配合驻沙湖日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向西流河我四十三团阵地进犯。我军隐蔽于河堤下，当敌伪进至距我阵地二百公尺时，我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并与日寇肉搏，将其全部击毙，俘伪军四百余人。除自愿留下抗日者外，其余都发给路费释放。获释伪军到处宣传我军政策，规劝同伙放下武器。以后伪军每遇我军，就有的举手投降，有的不战即溃，甚至伪兵工厂厂长被俘后也主动承认自己身份，将汪步青命令埋藏的造枪设备（其中有十余部精密机床），以及步枪和机枪枪身都交了出来，我们共用了十三只木船才运到湖区后方。

全歼汪步青伪定国军第一师之战，开始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参加。以后商清正在襄河北岸活动的十三旅旅长周志坚同志和政委方正平同志亲率该旅一部分部队渡河来增援，我们组成了临时指挥机关，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才基本上结束这一战役。在消灭汪伪部队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我军在彭家场附近的胡家台发现由沙湖出扰之日寇数百人，与之激战终日，双方伤亡达三百人以上。

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我军共作战十四次（对伪军和日寇各七次），除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外，还击溃伪定国军第二师千余人，击溃日寇七次增援，毙伤日寇二百余人，俘伪军九百五十余人，缴获了兵工厂全部设备和大批军用

物资。最后，汪步青本人也被生擒。

至此，在襄南东部，如汉阳之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泗沟、水洪口、曲口、窑头沟、三羊头、九沟，沔阳之西流河、周家帮、何家帮及汉川之南河渡、西江亭等大片国土，基本上为我控制。我们不仅粉碎了敌伪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扩大了根据地。在侏儒山战斗期间，我手枪队员几度潜入武汉市区，广泛散发传单，更扩大了这次战果的政治影响，使武汉敌伪一夕数惊，不时被迫戒严。此后，我小型武装经常出没于武汉近郊的姑嫂树、舵落口、郭茨口、十里铺等地。武汉商人为我军转运物资时，甚至公开向敌特声明：“这是四老板（指新四军）的！”敌特慑于我军声威，怕受到惩罚，只好放行了。

一九四二年夏季，川汉沔地区抗日军民在对敌伪作战的凯歌声中，欢度五月端午节。两千余人汇集在襄河岸边，舞起龙灯，踩着高跷，像风暴卷起的狂潮，由这个村庄，涌进那个村庄，人们齐声唱着嘹亮的歌：

龙灯头上青，
我们欢迎新四军。
龙灯头上黄，
我们恨的是东洋。
团结有力量，
军民合力打豺狼！

.....

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之战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不仅因为我们选择了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在华兵力减弱的时机，还因为我们深入敌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的政策，紧紧依靠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在军事进攻之前，对敌伪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制定出结合实际 的斗争策

略，先以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造成伪军内部分裂，丧失战斗力，然后辅以军事进攻，加上战术机动灵活，因此我军每战必胜。并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大的胜利。因这一胜利威胁到日寇的心脏——武汉重镇。日寇乃抽调重兵并随带伪军熊剑东、邹平凡数千人对我侏儒山进行围剿。我军遵师部命令，主动撤离襄南东翼，集结到白兆山一带应付顽军的进攻，只留范敏夫（现名樊明甫）同志率少量兵力以天汉游击支队名义坚持游击战争。

侏儒山之战是胜利开辟襄南的开端，而扭转襄南全局的战斗，是在以后进行的。

(四)

在我军进军入汉沔期间，直至一九四二年末，襄南西翼及中部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汉川等县除县城为日寇侵占外，大部农村仍是国民党一二八师和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二游击纵队控制的。一九四三年二月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受挫，日本帝国主义为尽早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调兵力转赴其他战场，向蒋介石进行压降，麇集了主力部队三万人，进攻襄南。面对日寇进攻，国民党一二八师一触即溃，师长王劲哉被俘后，在武汉发表声明称：“劲哉抗日任务已经完结，如今解甲归田。”以所谓“改邪归正”为由劝其所部接受日寇整编。王劲哉投敌后，余部均分别投敌。记得有一位爱国的田连长（名子我忘记了），从伪军据点田二河古鼎新旅拖出全连反正，并威逼一个副团长跟着起义，我们曾给以“一二八师光复纵队”番号，号召一二八师投敌部队归队抗日。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副司令兼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金亦吾则不战而降，率部投敌。国民党部队有的被整编为伪军，有的溃散为匪，到处骚扰，于是襄南地区全部陷落。日寇奸掳烧杀，襄南西翼及中部的洪湖老根据地人民，不堪其害，纷纷要求我军渡河南进。

这时，天汉地委、襄西地委以及十五旅建制均已撤销，由我和李守宪、王海山、李人林、刘真、吴云鹏、陈秀山、谢威、黄海滨、李茵田、陈清（现名郭子清）等同志组成襄河地委，在十五旅基础上成立襄河军分区（又称三军分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驻在襄河北岸的观音湖一带。我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是党外人士杨经甫，王海山同志任副司令，李人林同志任参谋长，刘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守宪同志任副书记兼襄河地区行政专员。江陵地下党张礼成等同志来向地委反映情况，并要求派部队进入襄南。地委分析情况后认为：日寇攻陷襄南的目的在于占领洞庭湖西部地区，以打通粤汉铁路，其主力部队不可能在襄南地区滞留太久。如果我军本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挥师襄南，则既可以牵制敌人兵力，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以策应正面战场作战，又能收编国民党部队溃散武装，争取伪军反正，发展我军力量，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报请边区党委和师首长批准后，我们派三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同志和十五团旅四十五政委戈平同志率四十五团第一营作为先遣部队渡河。陈清同志因在潜江地区工作过。对该地区较熟悉，随部队作向导。

（五）

时维二月，序属初春。李人林等同志率先遣部队从京山南的泗港市和多宝湾两个伪军据点之间夜渡襄河，在聂家滩登岸后，即迅速挺进至江陵的三湖地区，与江陵地下党汇合。

此时，整个襄南地区除敌伪部队外，还有土匪和国民党溃散武装，总计兵力约万余人。比起这样的庞大数目，我先遣部队一营兵力显然力量甚微。但是，我军一去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初，我们收编了一二八师一位叫田

美艾的营长所部一百余人，接着，我们得悉原一二八师旅长倪辑五在部队打垮后已经回到洪宋家场，李人林同志又派干部持信往访，动员倪辑五与我们共同抗日，在我们耐心的说服动员下，倪辑五终于接受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职务，我们并劝倪参加“一二八师光复纵队”收容国民党溃散武装。不久，他的旧部就收集了五、六挺机枪和二百多支步枪，成立了江陵抗日自卫团，由倪辑五任团长。这时，我们原在襄北成立的“光复纵队”里，由于那个被迫起义的伪军副团长用阴谋手段将带头起义的那位爱国的田连长骗入伪军据点杀害，以致将这支起义部队被缴械，许多爱国者也被杀害。

对于已被日寇整编为伪军的原国民党部队，我们同样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争取他们反正。对甘心事敌执迷不悟者，则聚而歼之，如对伪军刘银国就是如此。刘银国部原系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二游击纵队金亦吾部直属大队，共六百余人，在日寇西侵时追随金亦吾投敌，被整编为伪军，驻守在张金河一带。开始，我先遣部队写信给刘银国，劝其反正，遭到拒绝。于是李人林同志率部队连夜进袭，将其击溃，俘百余人。接着，我军又在反扫荡战争中，歼灭监利伪保安大队一部。这时，其他伪军慑于我军声威，纷纷找我先遣部队接洽，表示愿意改恶从善。我们要求他们：第一，及时向我们提供日寇活动情报；第二，不准掳掠残害百姓。只要作到这两条，可以不予打击。这样，我们就又争取到江陵县岭河口、丫角庙等地的伪军曾尚武部，暗中为我所用。从此我渡河部队即在江陵、监利、潜江的三湖、白露湖地区立下脚跟。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襄南地区的领导，襄河地委继续派干部和部队奔赴襄南，成立了中共襄南工作委员会和襄南指挥部，李人林同志任指挥长，刘真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不久政委一职由方正平同志兼任）。襄南工委下设江陵工委

和荆（门）潜（江）工委，这时日寇不断向我军扫荡，襄南工委一经成立，即积极领导襄南军民，英勇地对敌进行反扫荡斗争。

一九四三年四月，江陵、潜江日寇二百余人，配合潜江伪军李正乾部八百余人分三路向我扫荡。李正乾原是金亦吾第二游击纵队的团长，他虽然追随金亦吾接受了伪军番号，但并非甘心事敌。于是主动向我军提供情报，我军及时转移，使敌伪军扫荡扑空。四月下旬我们争取到李正乾率部队八百余人反正，由潜江城郊开到我军驻地徐李市，被整编为我三军分区独立第一旅。此后，襄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就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五十五团全部渡河南进，除一营活动于江陵、土地口、张金河为中心的三湖、白露湖地区外，四十五团团长江玉清同志率两个连活动于余家埠、老新口、周老咀，参谋长青雄虎同志两个连挺进到了普济观一带，兵分三路，向洪湖老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步步推进。

这时为了集中兵力便于机动作战，五师首长命令成立新的十五旅，以吴林焕同志为旅长，方正平同志为政委，方正同志为参谋长，刘放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由鄂东经襄北逐步开往襄南。这年五月，日寇再次进犯洞庭湖西部地区，适应形势变化，五师师部来电令十五旅归襄河地委和襄河军分区指挥，以统一行动。为了扩大襄南战果，师部又令襄河军分区转令吴林焕、方正平同志率十五旅旅部及四十四团（团长黄人杰，政委黄德魁）全部渡过襄河。

当我主力部队东进时，日寇为阻击我军，派伪十师第二旅朱炳坤部约二千人扼守熊口。熊口乃潜江西南重镇，为我军南取监利，东攻沔阳，挺进洪湖的必经之路。伪军不但在熊口镇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还在附近设了十多个据点。我军决定武力解放熊口。

熊口之战打响之前，我们仍然首先采取政治攻势。朱炳坤手下有位姓王的营长，原是李正乾的旧部，我们即请李正乾去动员

王营长反正，王表示愿在战斗打响后作我军内应，并在伪军中展开了工作。

六月六日夜，我十五旅四十四团及三军分区地方武装一部，由浩子口一带出发；四十五团两个营从土地坊出发，七日拂晓向熊口进击。战斗打响后，王营长即率部反正。经一天激战，我军攻占熊口街道北部，把伪军压迫到一角。午夜十二点，我军一面进攻，一面通过王营长喊话，并一再送信，迫朱炳坤投降。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朱炳坤被迫放下武器，宣布投降。我军即命令其部队撤离工事，开赴我指定地点洪宋家场集结受编。不料朱炳坤率部至洪宋家场后，竟企图率部向长湖逃窜。九日，我受降部队当即予以围歼，俘人、枪各千余。朱炳坤率残部逃窜。至此，熊口及附近的杨家场、马家场、吴家场、周家矶等敌伪据点均被拔除，潜江西部及南部地区都被我军控制。此后，即由西翼率主力向东南挺进，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相机打过长江。与此同时，为配合主力，又在天汉地区成立襄南（汉沔）挺进支队，由东翼渡河向西发展，分路向洪湖挺进。十五旅渡过襄河后，师部为了更好的集中领导，乃令十五旅归襄河军分区建制。我们随即得到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批准，在襄南地区成立了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由方正平同志任书记，吴林焕、李人林、刘真、刘放、方正等同志参加，统一领导襄南地区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

熊口之战不久，四十四团又在白露湖西岸的新观毙敌四十余名。通过这两次战斗，我军就在地下党配合下，在江陵潜江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敌后根据地，襄南西部地区基本为我们控制。

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下旬先遣部队挺进襄南，到这年六月上旬为止，共俘虏、瓦解、收编伪军和土匪武装二千余人。延安《解放日报》曾接连报道这一战果，陈毅军长也曾加以赞扬。我军力量在战斗中得到发展，稍事休整后，即继续向洪湖中心区东进。

(六)

“笑责南归何太迟，军民相见两无疑；狂风卷浪洪湖浪，重舞当年赤卫旗。”（作于一九四三年）

七月，正当莲花盛开，我十五旅四十五团踏着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的战斗足迹重返洪湖。

“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老根据地的人民奔走相告，挥舞着他们珍藏多年的赤卫队旗，拿起当年的梭镖，挖出了埋藏的枪支弹药，与我军胜利会师。

眼看我军挺进洪湖，日寇和伪军也急急拼凑兵力，组织扫荡，妄图将我挤出洪湖地区。洪湖伪军主要是监利县伪保大队王一鸣部。九月五日，正当王一鸣与日寇纠合一起，企图从东西南北四面合击我军前夕，我四十五团参谋长青雄虎同志在张家坊与其尖兵排遭遇，将其全部活捉。从伪军俘虏口中得悉其第二天日伪军配合扫荡的计划。第二天拂晓，我军化装成鬼子兵奇袭王一鸣部，除俘其中队长以下官兵六十余人外，在伪军中任政务指导的敌军官田中也被我生擒，敌伪的扫荡计划全部被粉碎。

与此同时，十五旅四十四团挺进到了天（门）潜（江）沔（阳）地区，拔掉潜江东南部敌人据点总口，打开了从这里通向襄南指挥部所在地熊口的通道。活跃在沔东的汉沔支队，也壮大力量，发展地盘，在洪湖与四十五团会合。

随着部队的胜利展开，为就近领导与指挥，我们不久就将襄河地委和襄河军分区的领导机关移驻襄南浩子口一带，以李人林同志为首成立了襄南中心县，下设江荆潜、监沔、天潜沔、潜西、川汉沔、襄西县，随后建立石（首）公（安）华（容）县，并相应建立了区乡一级政权，每县都有二三百人的县大队武装。我们的地方武装常常配合民兵，在船头垫起沙袋，架起机枪，出没于